

第四章

「語言的雙重特質」

索緒爾《橘園手稿》的詮釋學和美學涵義

簡瑞碧

臺灣大學

本論文透過三個歷史情境，探究索緒爾《橘園手稿》所揭示的否定辯證邏輯於跨藝術媒介研究的有效性：一、與德國十九世紀浪漫美學的關聯，尤其是黑格爾所提陳的《揚棄》以及寓言修辭法；二、參照1960至1980年代融合符號學與文學詮釋學的觀點，說明索緒爾對比差異符號結構於化解詮釋衝突的功能，並且提供詮釋主體架構不同詮釋方法的模式；三、重探1960至1980年代美學領域關於定義藝術本質以及重建藝術史必要性的爭議。文末以比較文學中的「創造性叛逆」概念總結索緒爾的歷史與符號概念，並以此澄清符號學、詮釋學和美學所共享的研究對象。

一、導論：索緒爾現代語言學概念起源之爭議

眾所周知，法國文藝史學家泰納(Hippolyte Taine, 1828-1893)以系統概念建構跨國文藝史、文藝批評，然而，他的著作中有一較鮮為人知的面向，此面向由美國丹麥裔學者阿爾斯列夫(Hans Aarsleff, 1937-)於1980年代提出，他認為泰納關於語言符號以及認知等觀念曾深刻地影響了索緒爾(Aarsleff 1982b)，並且引用泰納《論智力》

(*De l'intelligence*, 1870)一書的第一章以證明泰納與索緒爾關於語言符號的觀念乃如出一轍。此外，阿爾斯列夫回溯至十八世紀康迪雅客(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1715-1780)、十七世紀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語言哲學，以建立起索氏於語言哲學發展史當中與先行者一脈相傳的關係(Aarsleff 1982a)。儘管如此，索緒爾橘園手稿(Orangery manuscripts)法文版於2002年出版之後，阿爾斯列夫的觀點遭受嚴重挑戰，尤其是英國愛丁堡大學的約瑟夫(John Joseph)認為索緒爾受其前輩自然史家皮克特(Adolphe Pictet, 1799-1875)的影響遠超過泰納，約氏自索緒爾年少時的研讀日記以及家族關係證明此關聯(Joseph 2003)。稍後，阿爾斯列夫與約瑟夫並且於《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展開論辯，前者認為後者將索緒爾帶向十九世紀唯心哲學的死路，忽略了索緒爾普通語言學強調語言使用者的經驗以及與社群所形成的契約關係。然而，後者則堅持索緒爾與皮氏於印歐語言研究方面顛撲不破的師承關係，並再次強調先驗哲學可解釋索緒爾理論當中橫向、非演化的語言規則，以及語言的非物質性等觀念。雙方各持己見，毫不退讓(Joseph 2004; Aarsleff 2004)。

索緒爾早年關於印歐語言的研究可落實於當時的歷史語言學、新文法學。但是，他後期開始發展、講授的普通語言學之思想淵源，長久以來一直是個謎題。主要原因在於索氏手稿破碎、不完整，學者在無法掌握文獻全貌的窘境之下，僅能旁敲側擊，自個別不同的學術立場、採取不同的路徑，以茲證明索緒爾局部理論與先行見解的細微關聯，或者批判其於某些領域應用的有效性。索緒爾於1913年謝世之後，經由其同事與學生編輯出版的《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雖經過大幅度的編輯，但卻抹去了索緒爾的原貌。有趣的是，後世學者根據此版本發展了近一世紀以來的符號科學。此版本影響了俄國形式主義詩學理論、布拉格語言學派的功能主義，以及1960年代法國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同

時，對索緒爾語言理論批判的聲音也自各角落發出，主要為新馬克斯主義以及後結構理論等與語言結構有關的論述。1970年代美國符號學家西比奧克(Thomas A. Sebeok, 1920-2001)提出生物符號學之際，他則完全貶抑索緒爾的論點，並傾全力推廣普爾斯(Charles S. Peirce, 1839-1914)的理論模式(Bouissac 2004: 241, 256)。

無論是正面的影響或負面的批判，近一世紀以來學者所使用的材料主要為1916年的編輯版以及其譯本(de Saussure 1916, 1959)。自1960年代開始，學者根據索緒爾學生的筆記，重新整理三個教程，並已出版了法英對照本(De Saussure 1993, 1996, 1997)。同時，德國學者恩格樂(Rudolf Engler, 1930-2003)根據索緒爾學生哥德樂(Robert Godel, 1902-1984)的筆記出版了四本注疏本(de Saussure 1967, 1968, 1974)。自此之後，關於索緒爾普通語言學的研究進入另一個階段，舉例而言，《普通語言學教程》的第二英譯本便是根據恩氏的注疏重譯(de Saussure 1983)。此外，在比對過學生筆記的各個版本之後，學者開始懷疑索緒爾生前是否親自寫下普通語言學文稿。根據索緒爾於巴黎語言學會的弟子梅耶(Antoine Meillet, 1866-1936)的訪問錄，索緒爾生前的確正進行著書計畫。1996年，於索緒爾位於日內瓦的夏莊溫室中，學者發現了這批手稿，在最新的英譯本當中則稱之為「橘園手稿」(orangery manuscripts)。手稿經過恩氏與法國學者布給(Simon Bouquet)整理編輯，再加上恩氏之前的注疏材料，形成手稿與部份學生筆記對照本，以《普通語言學手稿》(*É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為書名，2002年由迦里瑪出版社(Gallimard)出版，此書之完整英譯本則於2006年由牛津大學出版。手稿當中較完整的一批文獻為索緒爾針對「語言的雙重特質」(*De l'essence double de langage*)所提出的研究方法，透過這批文獻，我們可以看到索緒爾推理嚴密，非指名道姓地批判當時的語言研究，進而推陳出其個人獨創見解的思考過程。再者，索緒爾表明，他所欲建立的語言符號學是以語言使用者(des sujets parlants)為主的科學，與十八世紀以降的語言哲學或

形而上學扯不上任何關聯(de Saussure 2006: 56, 64)。有鑑於此，此批文獻有助學界採取新的視角，將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視為與先行學派斷裂的科學，重新評估其研究方法之開創性以及延展至其他領域之可能性，而不是陷入阿氏與約氏等人無限回溯的泥淖當中。

二、浪漫美學、符號學、文學詮釋學之相互輝映

(一)、象徵、寓言與符號的邏輯

索緒爾橘園手稿於2002年以法文刊行之前，文學理論家如托鐸洛夫(Tzvetan Todorov, 1939-)、保羅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彼得桑迪(Peter Szondi, 1929-1971)皆論及索緒爾語言符號概念與十九世紀歐洲浪漫美學的關聯(Todorov 1982; de Man 1989; Szondi 1986, 1995)，三人思考的路徑使我們得以採取另一途徑，自美學興起的源頭重探索緒爾的符號概念，例如，十八世紀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以及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討論藝術類型的分野，以及藝術符號的特性。雖然萊辛與溫克爾曼各有其偏好的藝術類型—前者認為詩是最崇高、最具代表性的形式，後者則以雕像與繪畫為其立論的基礎，兩人皆視藝術創造與批評為「邏輯與智性」的活動，此與索緒爾於其1891日內瓦大學就職演講，以及橘園手稿所揭示的符號研究宗旨，不謀而合(de Saussure: 3-60; 93-116)。

托多羅夫發現索緒爾文稿中仍存有十九世紀德國美學哲學家所偏好的「象徵」(symbol)概念，尤其在關於回文(anagrams)研究的手稿當中(Starobinski 1971; Todorov 1982: 265-266)，但是《普通語言學教程》(1916)的兩位編輯則忽略「象徵」于索緒爾立論當中的位置，並給予我們索緒爾偏好「符號」且貶低「象徵」的印象(Todorov 1982: 269)。托鐸洛夫認為若自符號系統非指涉外物的特性來看，放置索緒爾於浪漫美學的脈絡中討論是可行的(1982: 270)。此外，在托氏

追溯浪漫美學家翻轉「象徵」與「寓言」(allegory)定義的部份，他則強調寓言與幽默(Witz)、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揚棄」(*Aufhebung*, sublation)的關聯，指出寓言突顯了矛盾並存的現象，並且使「和諧」(*Die Harmonie*)與「美」(*Das Schöne*)等概念在卓爾格(Karl Wilhelm Ferdinand Solger, 1780-1819)手中獲致完整的理論基礎，得以完全脫離古典摹擬論的制約，使象徵與寓言以更高的境界結合在一起(1982: 219-221)。值得一提的是，托鐸洛夫與德曼皆指出，象徵與寓言其實在溫克爾曼的藝術與美學理論中尚未分化。因此，溫克爾曼的《探究寓言》(*Versuch Einer Allegorie*, 1766)以及卓爾格的《美學講座》(*Vorlesungen über Aesthetik*, 1829)顯示兩個論述的時間點，我們可以透過兩位美學家，觀察如何結合象徵與寓言兩種修辭方式、如何以此種結合定義浪漫美學以及藝術史。

循此脈絡，我們應以索緒爾論著中象徵與符號、空間與時間法則並存為探究的前提，然而，問題是索緒爾是否曾提出關鍵性的「寓言」概念，得使其符號研究與美學傳統產生正相關？其實「象徵」(*signifiant*)這個用字是在他的第三個教程才出現(1910-1911)，在這之前他用「口語影像」(*image verbale*)以及「聲音影像」(*image acoustique*)來代稱其所討論的符號概念，強調其不斷變動的特性。此種特性在1891橘園手稿即已出現，而且索氏於手稿當中的推論方式充滿了浪漫美學的影子。於其手稿的後半部，索緒爾展演否定辯證邏輯，以差異對比推翻關於語言(意義)研究的傳統作法，尤其是關於字面義與衍生義、具體與抽象、內在精神與外在世界等二元對立，強調系統內部與系統之間的符號以否定邏輯互相依存，系統得因此不斷變動、文法概念所形成的疆界得以不斷改變(de Saussure 2006: 42-60)。他提出，語言研究應以一連串的「歷史狀態」(*états*)為對象，探討其之間彼此接續(*continuity*)，但卻又因為絕對的差異(*radical disparity*)而互相否定，並以此為基礎引發新的想法或意涵(2006: 59)，這樣的說法回應了卓爾格的寓言概念以及黑格爾氏的揚

棄。在浪漫美學的脈絡中，關於語言、藝術符號的產生、衍生，以及詮釋皆是否定的否定(negation of negation)。

(二)、美學興起與語言符號之關聯

儘管索緒爾與黑格爾皆以否定為其論述工具，對我們而言，結合兩者最大的問題在於其是否對語言符號有一致的看法，尤其是黑格爾常為後結構學者攻訐有神學、超越以及目的論傾向，哲學家如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甚至認為黑格爾的方法對於研究藝術的現代性無多大幫助(de Man 1982: 764-765)。然而，黑格爾關於修辭以及語言的看法，德曼在他重讀黑格爾《哲學科學百科全書》(*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1817)的第二十小節得到啟發—此部份文稿通常簡稱為《心智哲學》(*Philosophy of Mind*) (1982: 761)。他認為，1830年出版的《美學》(*Aesthetics*)標示黑格爾方法論的必要矛盾，其美學以古代藝術為標竿，但卻又宣稱藝術早已終結(the end of art)，此矛盾正存在於「象徵」與「符號」(Zeichen)之間的角力，也就是說，符號迫使人們必須忘記已經存在於記憶中的象徵，才得以展開對美學的探索。基本上，黑格爾視所有基督教興起之前的藝術為象徵，這些象徵與外在事物有絕對的指涉關係，然而，基督教興起之後的宗教藝術則偏好「寓言」，這樣的藝術呈現方式理應像法條或文法一般，讓觀者可以清楚感知其所傳達的意涵，但是，觀者實際經驗到的，卻是一種主詞與謂語無法結合的狀態(I cannot say I; I am not I; the separation of the subject from the predicate) (1982: 775)，也就是某種自我視覺經驗的否定，與外在現實切斷指涉關係，而且這樣的經驗與語言符號的特質有絕對的關聯。

德曼發現，黑格爾在論述美學之前，即已於《心智哲學》討論語言符號，其基本特性在於感知的內容(the content of perception)與概念的內容(the content of which it is a sign)之間沒有絕對的關聯，

黑格爾並以義大利國旗為例，指出其三個顏色與其所要傳達的義大利性(*italianité*)是兩回事。黑格爾的概念與索氏提出符號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不謀而合，而且，我們可以透過黑氏瞭解索氏於橘園手稿開端所強調的符號異質的兩面性(*an odd mixture*)。對兩者而言，符號做為一種智性活動，既是自由也是束縛，而且無法表達其想要傳達的概念(*the sign does not actually say what it means to say*)。另外，德曼也以此符號的特性，解讀黑格爾美學當中的矛盾，也就是說，人們雖然記得並可以看見古代藝術流傳下來的圖像以及文字，但是，無法確切獲知其所傳達的意涵，矛盾在於人們僅有記憶但卻無法回想(*memorization rather than recollection*)(1982: 772-773)。因此，美學的探索雖然植基於記憶當中由各個歷史階段(*états*)收集而來的形式(*forms*)，但人們卻必須不斷否定這些形式，得以引發原始意圖之外的新意涵。如此說來，黑格爾、卓爾格，以及索緒爾皆謀劃著「寓言」正名計畫，視「符號」與否定為語言、修辭與視覺藝術所共用的型態與法則，並以此宣示分析性藝術研究方法的誕生。

(三)、文學詮釋學克服歷史鴻溝、消解詮釋衝突

雖然黑格爾的美學為許多德法思想家所共用，但是，關於其延展性，也就是應用至文藝研究的有效性，遲遲未能有所突破，主要原因在於，宣告揚棄其方法的德國哲學家，未能正視黑格爾關於語言符號的立論。曾提出突破性看法的學者，除了上述所言德曼之外，尚有文學詮釋學家桑迪。桑迪于1960年代于柏林重建比較文學研究方法，不僅立基於黑格爾的揚棄(*sublation*)，亦融入索緒爾的現代語言學概念(*langue/parole; syntagme/paradigme; signifiant/signifié*)(Szondi 1986: xiv, 104, 174; 1995: 68, 86, 122)，目的在於(1)以否定以及語言符號觀點重新解讀十八世紀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 1768-1834)提出的神學詮釋學方法；(2)提陳十八世紀下半葉至十九世紀上半葉浪漫美學的現代性，並且「修正」(1)十九世紀中葉實證主

義對文藝研究所造成的誤導；(2)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狄爾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以唯心的方式解讀史氏；(3)德國哲學家對於二十世紀上半葉威瑪時期文藝的消極看法(1986: xv)。

桑迪認為，解讀聖經的傳統方法——文法派(grammatical approach)——僅是透過代換某些字眼，消除現今讀者與過去文本之間于字面意義上的矛盾或是歷史鴻溝。反觀另一方法——寓言派(allegorical approach)——則是以現今讀者的「智識空間」(intellectual universe)為出發點，詮釋者必須採取特定觀點，應用某種方法(praxis)克服矛盾以及歷史鴻溝、積極介入文本解讀，並且發掘文本多層次的意涵。因此，「寓言」修辭法、浪漫美學，以及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生命與經驗哲(*Lebensphilosophie, Erlebnispsychologie*)能突顯詮釋主體與文本之間的歷史、社會以及美學面向，使文本解讀跳脫出局限於字裡行間的封閉性行為(1986: 96-97; 1978: 20)。桑迪展演其方法論的關鍵著作——“*L'herméneutique de Schleiermacher*”——首先刊登於由托鐸洛夫、簡奈特(Gérard Genette, 1930-)、巴爾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等人所發起的文學期刊《詩學》(Poétique)的第二期(Szondi 1970)，見證符號學與詮釋學方法論融合的必要性，並開啟了一連串應用于文本的分析性著作。托鐸洛夫於2001年接受訪談、回顧其學術生涯之際，仍難忘其與桑迪之間因英雄所見略同而建立的深刻友誼(Todorov 2008: 104)。

正如丹麥符號學家耶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 1899-1965)所言，語言符號的「雙重」特質(duality)以及曖昧性(ambiguity)難為邏輯實證哲學家所理解(Hjelmslev 1948; 1959: 33)，尤其當他們看待語言或文藝現象之際，常將其與外在現實或社會道德問題做直接聯想，難以想像意義(content)並非單一或不證自明，它也可以像表述(expression)一般以不斷細分的方式被拆解、建構、分析。呂格爾(Paul Ricoeur, 1913-2005)與高達美1976-77年間于芝加哥大學進行關於詮釋方法的論辯，此論辯顯示融合符號學與詮釋學方法最大

的阻力仍來自哲學。然而，我們卻也發現，討論「詮釋的衝突」(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此項課題之際，利科仍是以結合黑格爾與索緒爾——否定辯證加上差異結構分析——的方式疏通精神分析、馬克思主義、人類學，以及現象學之間的落差(Bruzina and Wilshire 1982: 316-320)。首先，呂格爾認為詮釋的衝突並不存在，實際存在的是理解(understanding)程度上的差別，而我們應視不同的詮釋方法為一漸進的過程(a movement of many interpretations)，這個過程可細分為詮釋者如何於不同「階段」解釋、挪用、理解文本(a movement between phases of explanation, appropriation and understanding)(1982: 307)。

再者，不同的方法當中有各式不同的術語(theoretical terms)，呂格爾認為這些術語的存在是必要且合法的，因為唯有透過這些術語，詮釋者得以「仲介」(mediate)，而不是直接地陳述(narrate)其經驗與文本；解釋與詮釋應與經驗本身保持距離，詮釋者應透過各種不同方法所形成的象徵系統——也就是後設語言(metalanguage)——呈現其理解文本的方式(1982: 311)。最後，呂格爾以仲介為核心概念，架構其方法與高氏提出之「視域的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共通性，並且導向所有詮釋方法的共同目標——如何透過結構分析，進而理解文本所隱藏更深刻的意涵(not a kind of naïve reading, but a learned reading)，也就是，無法在文本表面立即察覺的意涵(1982: 316-317)。因此，針對單一文本，不同的詮釋之間，於時間以及歷史的進程中，處於既是相似(homological)亦是否定辯證(dialectical)的關係，關鍵在於進行詮釋的主體如何架構此等「差異」(the capacity to situate differences with respect to or within [one's] own interpretation)(1982: 320)。

三、否定辯證與現代美學、藝術本質、藝術批評的關聯

就藝術史而言，否定的問題意識源自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當

時的畫家以「不在表面上的，就是了」(*quello che non è, sia; that which is not, is*)為其創作的標竿 (Summers 2009: 29)，強調藝術作品可能引發的視覺效果。此外，黑格爾於當代藝術研究方面仍具效益，美學與藝術史學者合編的新書《表像的矛盾》(*Paradoxes of Appearing*)刊登數篇運用黑氏否定辯證，分析現代藝術創作的論文—媒介涵蓋繪畫、建築、電影等，揭示因時間、空間、接受主體感官之間的落差而造成的幻象(*apparition*)，並重新定義表像為置於關係網絡中的觀看過程(*relations emerge or are created; appearing as a process*)。此研究方法切斷藝術表像與外在事物的語意關聯(*semantic relationship*)，視表像為各種感知矛盾的集合、互動，以及因此等互動而不斷增生的問題(*situated problems*) (Anderson and Oxvig 2009: 22)。

反觀1970至1980年代，西方美學界興起重新定義「藝術」本質的熱潮，這波熱潮反抗1950至1960年代某些美學家誤用維特根斯坦 (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1889-1951) 的「家族類似性」(*family resemblance*) 概念，以量化、任意連結單一特徵、抽離情境的方式，逃避定義藝術本質的課題，並因此宣告藝術的終結以及定義藝術無用論 (Carroll 2000: 12-13)。復興定義藝術本質的主要戰將們包括沃海姆 (Richard Wollheim, 1923-2003)、馬高利斯 (Joseph Margolis, 1924-)、丹托 (Arthur Danto, 1924-)、迪奇 (George Dickie, 1926-)、凱羅 (Noël Carroll, 1947-)，這些美學家提醒我們，藝術史、藝術理論，以及藝術派別與建制的重要性。換言之，並非任意的外在事物或是日常生活物件皆可成為藝術，定義藝術或是創造藝術作品需要的是情境 (*situations*) 或是背景 (*contexts*)。以沃海姆為例，他闡釋「看作」(*seeing-as*) 以及「看穿」(*seeing-in*) 兩種看似矛盾的視覺經驗，提出以否定辯證結合兩者，形成「雙重視覺」命題 (*the twofold thesis*)，並以此修正岡布里希 (Ernst Gombrich, 1909-2001) 於《藝術與幻覺》(*Art and Illusion*, 1960) 一書中提出的視覺轉換理論 (*switching, alternating perception*) (Wollheim 1992: 213-214)。沃海姆認為，幻覺產生的原

因，並非僅歸諸於「看作」於時間進程中或不同歷史階段可能產生的多種事物樣態，而是因為「看穿」讓我們可以「同時」感知到存在以及不存在於作品中的事物(unlimited simultaneous attention)；換言之，觀者的概念(concepts)與其所察覺到的事物，應於觀看的當下同時產生(Wollheim 1992: 212, 217, 221)。根據沃海姆的推論，觀看藝術作品與使用語言符號為類似的經驗，藝術的本質存在於觀者以及語言使用者的內在世界，此世界不斷上演著駁雜概念之間彼此競爭的戲碼。此外，丹托認為，即使是現成品藝術(ready-mades)亦非僅單純地指涉外物，並非觀者觸目所及皆可成為藝術。我們應視藝術作品為批評事件(criticism; critique)，這些事件所包含的是創作者架構其與先行藝術家(與其作品)之間的關係的方式，而觀者以及美學家必須追溯、重建、瞭解這些批評結構，才得以獲知藝術的本質以及藝術作品的意義(Danto 2000: 139-140)。

四、結語：以創造性叛逆概念理解文藝現象

除了十九世紀浪漫美學的脈絡之外，本論文試探黑氏與索氏、符號學以及文學詮釋學方法論融合的合法性，亦可見於當代美學以及比較文學。基本上，這兩個領域於1960至1980年代皆強調詮釋與意義的建構。例如，法國文藝社會學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 1918-2000)於1961年比較文學年報提出「創造性的叛逆」(*trahison créatrice*; creative treason)概念，以翻譯以及改編(translation, adaptation)等心智活動理解文學史的演變，補充說明既有的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埃斯卡皮認為文學史當中包含許多刻意的誤解或扭曲(deliberate misinterpretations or distortions)，而這些現象不僅是藝術活動產生意義的情境，也是比較文學研究的物件。他並且指出，美感(aesthetic)這個字於希臘文(*aisthanomai*)原指感覺(to feel)，但後世比較傾向用感知(perception)來理解美學以及文藝創作，這樣的轉變意

味著，後來的文學、藝術家不可能與其先行者共用認知方式，也因此誤解以及扭曲是必要的，我們重建先行者與繼承者之間溝通與理解彼此的方式，必須要建築在這些基礎之上(Escarpit 1961: 16-17)。換言之，創作的形式以及概念，並非物理性地由一個時空傳遞至另一個時空(transmission)；文學、藝術史中的創造性叛逆所標示的是價值系統的轉變、創作方式的重組(a shifting of values, a rearrangement of the poetic pattern)(1961: 16, 20)。此外，現今瑞典林奈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愛樂斯崇(Lars Elleström)亦指出，背景以及操作情境(contextual and operational qualifying aspects)之重建為現今跨藝術媒介研究的基本工作(Elleström 2010)。背景情境包含媒介的起源、在何種歷史、文化，以及社會情境下被發明、被藝術家採用以及沿用；操作情境則說明創作者如何融合既有的媒介、闡發新的技術，如何衡量、取捨溝通以及美學的標準(2010: 24-26)。愛樂斯崇認為，藝術作品所誘發的感覺(sensations)應為觀者意義詮釋的後果(the results of an interpretive, meaning-seeking mind)，因此，觀者(或研究者)所採取的方法足以影響其感知結構，符號學以及文學詮釋學之融合為跨媒介研究之理想工具(2010: 21)。

引用書目

- Anderson, Michael Asgaard; Oxvig, Henrik. "Paradoxes of Appearing." *Paradoxes of Appearing: Essays on Art, Architecture and Philosophy*. Eds. Michael Asgaard Anderson and Henrik Oxvig. Baden, Switzerland: Lars Müller Publishers, 2009. 7-23.
- Aarsleff, Hans. "Condillac, Taine et Saussure." *Condillac et les problèmes du langage*. Geneva: Slatkine, 1982a. 165-173.
- . "Taine and Saussure." *From Locke to Saussure: Essays o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London: Athlone, 1982b. 356-371.
- "Duality the key: Saussure's debt to Taine in conceiving 'the double essence of languag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5290 (Aug. 20, 2004): 12-13.

- Bouissac, Paul. "Saussure's legacy in semiotic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ussure*. Ed. Carol Sander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40-260.
- Bruzina, Ronald; Wilshire, Bruce. Eds.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Debate with Hans-Georg Gadamer." *Phenomenology, Dialogues and Bridg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2. 299-322.
- Carroll, Noël. "Introduction." *Theories of Art*.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0. 3-24.
- Danto, Arthur. "Art and Meaning." *Theories of Art*. Ed. Noël Carroll.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0. 130-140.
- de Man, Paul. *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2nd Ed. Intro. Wlad Godzich. London: Routledge, 1989.
- . "Sign and Symbol in Hegel's *Aesthetics*." *Critical Inquiry* 8 (1982): 761-775.
- de Saussure, Ferdinand.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Fascicule 1 & 2. Ed. R. Engler.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7.
- .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Fascicule 3. Ed. R. Engler.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8.
- .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Fascicule 4. Ed. R. Engler.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4.
- .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Eds. C. Bally, A. Sechehayé, and A. Riedlinger. Trans. & Annotate. R. Harris. London: Duckworth, 1983.
- . *Deuxiè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08-1909) d'après les cahiers d'Albert Riedlinger et de Charles Patois / Saussure's Second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neral Linguistics (1908-1909) from the notebooks of Albert Riedlinger and Charles Patois*. Ed. E. Komatsu. Trans. G. Wolf. Oxford: Pergamon, 1997.
- . *É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s. Simon Bouquet and Rudolf Engler. Paris: Gallimard, 2002.
- . *Premier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07) d'après les cahiers d'Albert Riedlinger / Saussure's First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neral Linguistics (1907) from the notebooks of Albert Riedlinger*. Ed. E. Komatsu. Trans. G. Wolf. Oxford: Pergamon, 1996.
- . *Troisiè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0-1911) d'après les cahiers d'Emile Constantin / Saussure's Third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neral Linguistics (1910-*

- 1911) *from the notebooks of Emile Constantin*. Ed. E. Komatsu. Trans. R. Harris. Oxford: Pergamon, 1993.
- . *Writing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Carol Sanders and Matthew Pire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Elleström, Lars. "The Modalities of Media: A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Intermedial Relations." *Media Borders, Multimodality and Intermedial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1-48.
- Escarpit, Robert. "'Creative Treason' as a Key to Literature."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10 (1961): 16-21.
- Hjelmslev, Louis. "Structural Analysis of Language" (1948).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Copenhague*. Vol. XII. Copenhagen: Nordisk Sprog-og Kulturforlag, 1959. 27-35.
- Joseph, John. "Pictet's Du Beau (1856) an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Saussurean Linguistics." *Historiographia Linguistica* 30.3 (2003): 365-88.
- "Root and branch: Pictet's role in the crystallization of Saussure's thought."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5258 (Jan. 9, 2004): 12-13.
-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Laocoön: An Essay on the Limits of Painting and Poetry*. Trans. & Intro. Edward Allen McCormic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 Solger, Karl Wilhelm Ferdinand. *Vorlesungen über Aesthetik* (1829).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2.
- Starobinski, Jean. *Words upon Words: The Anagrams of Ferdinand de Saussure*. Trans. O. Emme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Summers, David. "The Archaeology of Appearance as Paradox." *Paradoxes of Appearing: Essays on Art, Architecture and Philosophy*. Eds. Michael Asgaard Anderson and Henrik Oxvig. Baden, Switzerland: Lars Müller Publishers, 2009. 25-55.
- Szondi, Peter.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Hermeneutics*. Trans. Martha Woodmanse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Hermeneutics." *New Literary History* 10.1 (1978): 17-29.
- . *On Textual Understanding, and Other Essays*. Trans. Harvey Mendelsohn.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 . "L'herméneutique de Schleiermacher." Trans. Antoine Buguet. *Poétique: Revue de théorie et d'analyse littéraires* 2 (1970): 141-155.
- Todorov, Tzvetan. *Duties and Delights: The Life of a Go-Between. Interviews with Catherine Portevin*. Trans. Gila Walker. London; New York: Seagull, 2008.
- . *Theories of the Symbol* (1977). Trans. Catherine Porter.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 Winckelmann, Johann Joachim. *Reflections on the Imitation of Greek Works i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87.
- . *Versuch Einer Allegorie, Dresden 1766, and De L'Allégorie, Paris An VII 1799*. New York;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76.
- Wollheim, Richard. "Essay V. Seeing-as, seeing-in, and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Art and Its Objects. With Six Supplementary Essay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05-226.